

吴长庚 选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蒋士铨诗選

乾隆三大家诗选丛书

詩選

蒋士铨诗选

乾隆三大家诗选丛书

吴长庚 选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乾隆三大家诗选丛书

蒋士铨诗选

吴长庚 选注

责任编辑：弦 声

责任校对：暴 哲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 新乡市 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插页8,25印张 189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2,750 册

ISBN 7-5348-0267-9/I·125 定价：3.75 元

内 容 提 要

清代诗人、戏曲家蒋士铨的作品被尊为“近时第一”。
“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有清一代，他以诗歌、戏曲成
就双标第一。他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

本书从蒋士铨的四千多首诗作中精选出二百余首加以
评注。释义确切，评语汇各家之言，使人得到审美的领
悟，无论对于一般读者欣赏，还是研究者参考都很有帮
助。

作为蒋士铨诗歌的第一个选注本，相信本书会得到读
者的厚爱。

乞雨峯畫屏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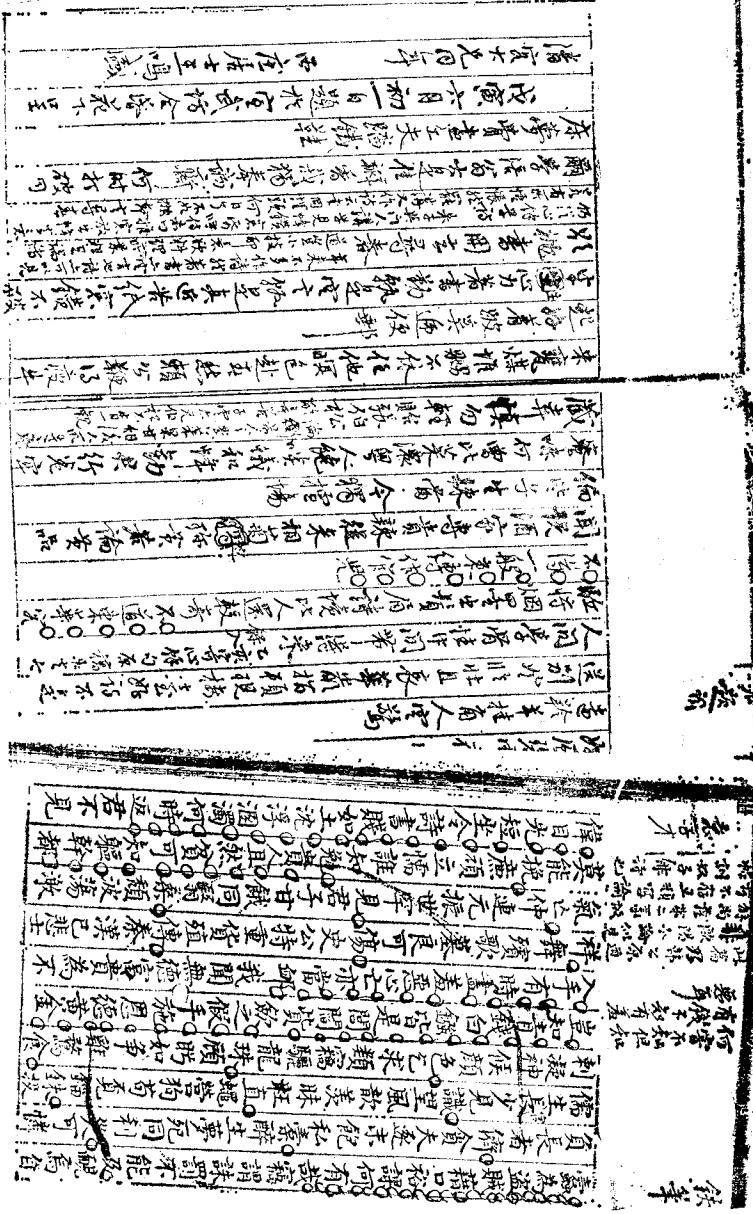
國璽

閻鼎

書學書家書画學画家画來
縛規矩中可守亦已隘兩峰
嶽等人身稟軼流輩展足
裂地維放手破天械眇眼燈
溫犀萬鬼失狡猾神光剝手

瞳人下遠轉輪界空但胡中
丞坐照入幽深游戲弄不律

蒋士铨手书册页（蒋炳勋先生家藏）



有袁枚等评笺的蒋士铨手书诗稿(右)和王鸣盛题辞(北京图书馆藏)

前　　言

蒋士铨字心馀，一字苕生，号清容，又号藏园。晚年号定甫、离垢居士。江西铅山县人，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号称“风会一变”的渠帅之一，王昶标为当代之首，与袁枚、赵翼并称“三家”而共同领导了乾嘉诗坛。他的戏曲成就亦高步一时，李调元评为“近时第一”，梁启超称为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日本青木正儿尊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殿军。有清一代，蒋士铨独以诗歌、戏曲成就双标第一，实在是清代文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家。

—

蒋士铨生活在清朝“康雍乾盛世”的中后期。经过近百年的休整，国内生产发展、经济发达、政权巩固、文化繁荣的趋势至此已渐露衰落之迹。鉴于李自成起义、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面对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现实，清统治者将血腥镇压和笼络收买结合起来，加快了汉化的步伐。在政治上提倡“满汉一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在思想上崇拜孔孟程朱的儒学，宣扬三纲五常；在组织上开博学鸿词科，罗致全国名士入翰林院供职或充当中央与地方的官吏。同时，大力开展汉族文化典籍的整编工作，“寓禁于编”，以求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如雍正

三年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乾隆四十九年完成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史哲的大综合时期，在综合中创新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点。蒋士铨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的思想与文学创作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清雍正三年（1725），蒋士铨出生于南昌垣东街小金台前旧宅。他虽家境清寒，却从小就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母钟令嘉，知书识礼，工诗善文，著有《柴车倦游集》。父蒋坚，性好任侠，长习法家言，有古烈士遗风。佐幕山西，屡雪疑案，为当世所重。著有《求生录》四卷，《晋昌纪狱》二卷，《铁案》、《剑旁诗》、《书法指南辑说》各一卷。蒋士铨四岁，母即断竹篾为波磔点画，攒簇成文，教之识字。稍长，即授以《四书》、《礼记》、《周易》、《毛诗》，使之成诵。其母教子得法，且课督甚严，酷暑严寒，未尝少倦。甚而至于病中，仍以唐诗粘四壁，母抱持行走其间，教之低吟以为戏。十岁时，父患其读书膝下，不免为常儿，他日为文，难免书生态，乃缚之马背，历游燕、赵、秦、魏、齐、梁、吴、楚间，睹淆函、雁门之壮，览太行王屋之胜，就读于凤台县王氏之馆。王氏乃康乾时富甲一郡的大户，家藏图书极富，蒋士铨随父即居于楸木麻王氏楼中，得尽阅所藏，遂成淹博。

乾隆九年九月，蒋坚举家南下，为士铨聘南昌张氏女。翌年冬完婚。婚后，蒋士铨随父归铅山老家，就学于永平北门街张氏塾中。值殿撰金德瑛督学江西，来铅山，得士铨诗卷，奇之，拔补弟子员。且以其试卷示于众，说：“喧啾百鸟群，见此孤凤凰，将来未可量也。”此后，士铨乃从学于金，“船窗署斋，一灯侍侧，凡修己待人之道，诗古文词所以及于古，孜孜诲迪，未尝少倦。”一年中随使车历游抚州、建昌、吉安、赣州、南安、瑞州

等地。读书与壮游，陶冶了他的性情，开阔了他的心胸。“磊落作壮游，不知行路难”，“丈夫志四海，家室安足恋”，正是他青年时代的真实写照。

怀抱着“安能老丹穴，而不思明堂”的壮志，憧憬着“一飞仪虞庭，再飞鸣岐阳”的未来，他从二十三岁开始北上求仕。然而蒋士铨的踏入仕途，却并非一帆风顺。他先后三次公车，卒未能遇，只是在乾隆十九年，才与赵翼同时得到个内阁中书的小官。他只做了几个月，就请假回去了。直到乾隆二十二年，他三十三岁，才得中进士。入庶常馆，熬过了三年“尚习雕虫业”的痛苦生活，终于散馆，钦取第一，授翰林院编修。此后四年， he除了曾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和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外，一直供职翰林院，久未升迁。他的“我生不愿作公卿，但为循吏死亦足”的愿望也得不到实现，于是，便于乾隆二十九年毅然辞官南归了。

蒋士铨辞官之因如何？各书所载未详。他自撰的《清容居士行年录》提到：“裘师颖荐予入景山为内伶填词，或可受上知，予力拒之。八月遂乞假去，画归舟安稳图。”裘师指裘曰修，江西同乡，时为工部侍郎，以治水有方深得乾隆器重，所荐事当非虚妄。但裘既为同乡友人，所荐或出于好心，决不致因“力拒”而反目、因避祸而辞官。裘死后，蒋为作墓志，对他犹推崇备至。可见友情之深，因而此说恐为托词。而《铅山县志》载，蒋士铨名震京师后，“有某显宦欲罗致之，士铨意不屑，自以方枘入圆凿，恐不合，且得祸。钟太安人亦不乐俯仰黄尘中，遂奉以南旋。”某显宦指谁？各书均无记载。惟徐珂《清稗类钞》及《清朝野史大观》直言蒋士铨“以刚介为和珅所抑”，然和珅用事在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此说或出于猜测。今查赵翼《送蒋心余编修南归》诗，有“敏捷诗如马脱衔，才高翻致谤难缄”之句，

且自注曰：“有间之于掌院者，故云。”又王文治送蒋离京诗曰：“亦有达官遭面斥”、“难免谣啄加蛾眉”。赵翼、王文治与蒋士铨同居翰林院，官编修，说他尝面斥达官而遭谣啄于掌院之前，绝非无中生有。同诗，赵又言：“世谓灌夫能骂座，我援沈吏劝书绅”，引《史记》灌夫使酒骂座而遭祸之事，劝蒋急流勇退并要他牢记此话。可见，谗间之事当必有。蒋士铨一生秉性刚直，磊落嵚崎，阮元说他“遇不可于意，虽权贵几微不能容。”很可能就是以面斥达官一事为依据的。这种个性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长期抑郁下僚，久不升迁。他曾在《贺新凉·叠韵留别纪心斋戴匏斋》词中说：“袞袞诸公登台省。看明时，无阙须人补。不才者，义当去。”分明是激愤之情见于言表。综合以上看，蒋士铨的辞官，当为面斥达官而致谤遭谗于掌院，因而长期抑郁下僚，自觉官场污浊，愤而求去的。

蒋士铨辞归后，未返江西老家，而选择了虎踞龙蟠的金陵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这原因一是铅山“本无田里可躬耕”，二是他所敬仰的诗人袁枚住在金陵，“荣枯总是同岑树，舒卷俱成入岫云。”三是“钟山本姓蒋”，他愿意仿效前人，留下“六代江山两寓公”的佳话。但他在南京与袁枚相聚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乾隆三十一年，他应浙抚熊廉村之聘，主绍兴蕺山书院讲习。得交任处泉、刘文蔚等越中诗人，山川如画，诗酒周旋，在这里度过了六个春秋。乾隆三十七年，他又应扬州运使郑大进之聘，主扬州安定书院。在这里结识了“扬州八怪”中之罗聘，他们诗画往来，交流艺术理想，批判社会现实，创作了大量作品。十年的教育生涯，是诗人创作的丰收季节，也是诗人创作风格的成熟阶段，他自言晚年“脱去依傍而为我之诗”，正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由于慈母的逝世，蒋士铨离开了扬州，奉母归葬于铅山之鹅湖山下。家居服衰期间，他积极向铅山县邑宰建议，修文峰塔，开焦溪坝，兴修紫溪黄柏坂水利，润田六千亩，建试院，开县东两耳门以利群众来往，皆被采纳实施。

乾隆四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赐诗彭元瑞。称彭与蒋为“江右两名士”，并屡问及之。消息传来，诗人感激涕零，于是，力疾起官，充国史馆纂修官，记名以御史补用。然而一病缠身，半体偏废，留滞京中六年，最后又以病辞归。居家一年多，于乾隆五十年二月病逝于南昌，终年六十岁。蒋士铨的晚年复官，表明了他的“用世心犹热”，他“苦怀经济心”，希望跻身仕途，施展自己的抱负，济物利人，建功立业。然而这希望的火花只闪烁了一阵，很快就熄灭了。袁枚序《藏园诗集》说：“君之初心，岂欲以诗见哉，及今病且老，计无所复，而欲以诗传，可悲也！”确为知人之论。他自言愿为循吏，是想踏踏实实地做点实际有益的工作，而他刚直不阿的个性，带来了他政治上失败的悲剧。于是，不平则鸣，发言为诗，创作出一系列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疾苦的诗篇，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

蒋士铨的诗歌作品，据清嘉庆三年扬州刻本《忠雅堂诗集》，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他还有数千首未刊诗，存于他的稿本中。

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文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从总体上看，他的文学思想偏于儒家的入世主义艺术观。他从“诗史”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社会作用，以为“作诗何异作《春秋》”，诗，必须

“于古人经邦致治之略”、“于一时之人心风俗有所关系焉”。因此，他以“事不出伦纪之间，道不出治平之内”来规范诗歌的内容，强调诗歌为“善国政、正风俗、厚人伦”服务，可见，他对诗歌的社会功利作用是看得特别重要的。但与此同时，他也并不忽视艺术的美感特征，认为“文章本性情……君子各有真”，“诗以性情深”，要以至性写真情，抒写胸中的郁勃之气。而且，这种真的性情必须根于性道，归于雅正的，因为只有“根于性道而出者，其文始克传世行远，灼然于古今。”所谓“性真所积一进露，风神气韵皆磊砢”之谓也。于是，在创作实践中，他试图将言志、缘情和载道三者结合起来，强调风雅传统，强调自立和创新，反对蹈袭模仿，他的诗歌创作，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蒋士铨的诗歌题材极为广泛，反映出清代中叶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体可分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反映民生长苦，表达诗人的深刻同情。这在集中比比皆是。一方面，蒋士铨出身寒门，家境清苦，这使他对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有较深的了解和体验。一方面，他“唯歌生民病”，是希望上达天听，得以“补助及沦胥”，救民于倒悬之中。《自夏镇赴南阳有述》是作者北上京城途经山东时，目睹黄河泛滥成灾，波及内地，造成人民流离失所，而写下的一篇充满血泪的文字。诗中详细地描绘了水灾造成的破坏性和受灾群众的痛苦，表现了灾区人民热爱家乡、眷恋故土的情绪，赞扬了他们重建家园的决心。同时，通过灾民之口，揭示了“南北互甘苦”、“去此等穷贱”的社会现实，将局部的灾难造成的痛苦上升到社会的一般性高度，使批判的意义更具典型化。此外，如《嘉兴道中》、《饥民叹》、《后饥民叹》、《飞蝗》等诗，都反映了农村中灾

情泛滥，使得“田亩漂沉乡井改”，“迫使万姓为饥民”的痛苦现实。他作于任官期间的《京师乐府词》，可说是具有现实主义光辉的代表作。这组诗共十六首，一诗一事，即事命题，表现出生活在“极乐”王都的下层民众的痛苦生活。其中有反映贫穷市民的，如《缝穷妇》写出了迫于生计而顶风冒雪在街头为人缝补谋生的妇女的悲惨命运；《鸡毛房》写的是一群沿街乞食的流民，他们既无蔽体之衣，更无栖息之所，“黄昏万语乞三钱，鸡毛房中买一眠”，冻毙街头将是他们的必然归宿。有反映城市服役士卒的，如《泼水卒》、《堆子兵》、《摇铃卒》等，他们“朝来愁雨复愁雪”、“晚来戴露还戴霜”，“敝裘风透寒莫当”、“破帽笼头冰满须”。此外还有反映浪迹江湖的杂耍、口技、卖唱、捏泥及戏曲艺人的，如《弄盆子》、《画眉杨》、《唱档子》、《兔儿爷》、《戏旦》等等，表现了诗人对民间艺术的高度赞扬以及由此而展示出的贵族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是反映京城市民痛苦生活的画卷，又是研究清代民间艺术的珍贵史料。“人饥若已饥，谁解急其急？”诗人对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群众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但愁民有殍，不虑食无盐”，“安得天雨粟，一卒饥鸿岁！”“关心百姓无衣者，安得求它化作绵。”从这些发自肺腑的诗句中，我们不难发现，诗人的心和广大人民群众是贴得较近的。

其次，是暴露黑暗官场，揭露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由于清乾隆朝残酷的文化政策，当时文人大多忌谈时病，甚至谈虎色变，噤若寒蝉。蒋士铨却是其中不多的敢于谲谏旁嘲、大胆揭露的诗人。他或借咏史、咏物来含蓄地表现，或用乐府的形式直接表现。如《读始皇本纪》无情地嘲笑秦始皇的暴虐和愚昧：“既欲求神仙，如何穿冢穴？”“苟能得长生，神仙亦尽诛。”

“生游阿房宫，死游骊山墓。行乐到魂魄，膏灯照泉路。”《响屩廊》写的是吴王夫差为西施建馆娃宫响屩廊之事，揭露的是最高统治者的荒淫无道，醉生梦死。在乾隆皇帝多次南巡，挥霍无度的日子里，这种揭露是有一定的警诫意义的。《果子狸》咏的是小动物，但“强者纷纷食弱肉，鼠食松花齧食竹。……君辈食禄多隐匿，跖行夷言资贪取。但能欺罔无不为，五能技巧夸鼷鼠。”分明是为某些权贵们画相。他的述怀诗则往往直抒胸臆，表达对官场黑暗，世道污浊的愤慨情绪。如“醉梦虚声未可居，百年势尽等焚如。高谈道学能欺世，才见方隅敢著书。荼茅苦甘生有数，蜣蝉清浊事皆虚。三年穷到无锥立，惭愧先生鼠壤蔬。”《再酬补园》写到“长袖则善舞，罗袜何翩翩；西施世上过，可怜值一钱。”对世道幽昧，黑白颠倒表现了极大的愤慨。《拟古乐府》、《禁砂钱》等诗则直接暴露了统治阶级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现实。他们或当街强夺：“搜求廛市系樵竖。贩负归来囊橐空。”他们或半路拉佚：“官吏甘心作五毒，咬啮公行万民哭。民车尽官车，官驴尽民驴。”他还用对比的手法，揭露了贫富悬殊的尖锐对立：“官厨酒肉臭，舞榭纱帷幕。富家餍盘餐，馀粒饱鸡鷄。”等等，这种揭露，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看，都是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

其三，纪游纪胜，描绘祖国大好河山，抒写诗人壮阔的襟怀。诗人半生飘泊南北，名山必登临，胜迹必观览，所谓“游踪所至，不负古人也”。他青年时代所写的山水诗大多气势磅礴，表现出诗人藐视困难，锐意进取的斗争精神和热爱祖国山河的真挚情感，“磊落作壮游，不知行路难。”“名宦谁能乐山水，诗人我或慚龙虎。”他的纪游诗大多写得豪迈壮阔，如青年时代随金德瑛使车南游时所写的《十八滩》，以奔腾豪纵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描

写了赣水的流急滩险，随后，他写道：“铲除欲遣五丁役，大斧劈裂冯夷宫。坐使鸿钩锻为烬，莫教叠架成飞虹。天水相涵朗如鉴，雪浪喷薄双江溶。大笑往来失阻碍，一泻千里开心胸。”表现出诗人改造山河的雄伟气魄和广阔胸襟。中年以后，他的记游诗融合了更多的身世之感，往往具有哲理思辩的意味。如《牵舟》一诗作于辞官归家的路上，诗的前半写诗人目睹纤夫生活的痛苦，接下去写了一个细节：“长绳划然断，倒退难剧升。劳者已颠蹶，逸者何所凭。悟兹倚伏理，庶几为我惩。”诗人的目的并非自责，而暗用《孔子家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的典故以暗暗警告当政者，“驭民”当有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使得“劳者已颠蹶”，那么危机就会出现了。在游览中，蒋士铨还写了不少凭吊古人的诗，如《梅花岭吊史阁部》赞扬了史可法“甘同马革自沉湘”、“生死南枝最孤直”的斗争精神。《止水亭吊江文忠公万里》、《谢文节祠》等诗，对江万里、谢枋得等先烈坚持民族气节倾注了由衷的赞赏。此外，他对为国捐躯的岳飞、文天祥等，对历史上的改革家如范仲淹、王安石等，都表达了仰慕和崇拜。

最后，我们还得提到蒋士铨的应酬诗。宏观地看，中国的诗歌自唐代达到了它的高峰以后，宋元以降，戏曲小说以其无可比拟的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的优势，逐渐取代了诗的正宗地位。诗在日趋衰落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进入人们的社会交往，应酬交际之中。翻阅明清诗人的集子，这种情况显得特别明显。所谓应酬诗，是人们因社会性的交际往还而互为赠答的诗，包含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内容，如送别迎来、题册题画、贺庆哀婉、酬和赠答等等。蒋士铨的应酬诗出于慷慨激昂的个性，大都发自肺腑，饱含深情而不作应酬套语。其中，有的针对自己或友人的遭遇，交流对黑暗官场的认识。如《谢苍涯丈西堂小饮次韵》、

《答靳大千树椿太守》、《再酬补园》等诗。有的表达纯真的友情及慷慨助人的品性，如《杨子载湖亭送客图》、《喜汪辇云至》、《哭彭正之》、《送归安沈宾上归葬》等诗。有的用于品鉴艺术，表现自己的艺术见解，如《题罗两峰画屏风后》、《题郑板桥画兰送陈望亭太守》等等。他用诗来论诗、论画、论书法篆刻、论民间艺术，以风神气韵作为美学标准，表现出高度的艺术鉴赏力。

毋容否认，蒋士铨的诗作中还有一些歌颂封建皇帝的恭和御制诗以及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表彰忠孝节烈的诗，这些诗，前人评价很高，今天看来，糟粕不少，是应当批判剔除的。

三

蒋士铨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对此，他自己已有认识。《学诗记》言：“余十五龄学诗，读李义山，爱之、积之成四百首而病矣，十九付之一炬，改读少陵、昌黎。四十始兼取苏、黄而学之。五十弃去，惟直抒所见，不依傍古人而为我之诗矣。”（《忠雅堂文集》卷二）十九岁以前的诗既已“付之一炬”，不存集中，自可忽略不计，那么，蒋氏学诗便经过了以少陵、昌黎为宗，兼取苏黄、脱去依傍而直抒性情三个阶段，验之于《忠雅堂诗集》，痕迹宛然。

他的诗以少陵、昌黎为宗，主要指青年时代的读书、壮游和求仕阶段。这一时期，他学诗以杜甫、韩愈为主，同时不拘一格，广取博收，不断丰富自己。诗歌语言以雄健质朴为要，风格豪宕飞扬，意境浑厚超妙，昂扬自成一家。他学唐人与时人之刻意摹仿迥然有别。他认为仅仅从语言形式等方面去学习古人，不过是

得其皮毛。在他看来，“诗人性情之厚，议论之醇，无过于少陵者”，杜诗“事不出伦纪之间，道不出治平之内，而趣溢于风骚，体兼乎雅颂”。（《杜诗详注集成序》）学杜就要学习杜甫深于性情和“诗史”的创作态度，内容上必须具有史的功能，面对现实，反映民生、社会的重大问题，抒写忧国忧民的情绪；艺术上，“性灵独到删常语，比兴兼存见国风”，须具风骚之趣，兼雅颂之体。因此，他学唐人，重在继承唐人的风雅传统、表现方法及风骨格调。他的《太行绝顶》二首气魄豪健，格调直逼少陵，而自抒人生感慨，情景浑然一气。《自夏镇赴南阳有述》以记行为线索，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篇章宏伟，语言恣肆，谲谏旁嘲，合于风雅，无愧于“诗史”之称。《止水亭吊江文忠公万里》被李宗瀚称为“春秋之笔”；《六朝松歌为彭字江倚华作》被刘文蔚誉为“少陵再出”。其余《到家》、《寄辇云》、《大千招饮语亡女事甚悲作歌慰之》、《哭张素村前辈》等诗，都深得老杜神味。

韩愈诗本从李杜入，他继承了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将杜甫晚年苦心孤诣的写作态度发展到追求奇崛险怪的一方面，为中唐诗歌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带来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尚险求怪的风尚。蒋士铨在学杜基础上的学韩，也发展了求险求奇、着意刻画的另一面。如《上滩》一诗，通篇纯似昌黎，其中刻划之句，如“殷雷出地奋，坤轴斗欲撼。高浪建瓴倾，碎石激丸卵。闻响气已夺，作势力犹悍。群龙舞幽壑，万马突飞栈”。押险韵、用奇字，铺张排比，穷形尽相。他融韩杜之长于一炉，善于以奔腾的气势、新奇的语言，表现大自然雄奇壮阔的景象，以开拓昂扬豪宕的心胸。他青年时代写的《开先瀑布》、《十八滩》、《三峡洞》等诗，都雄直奇崛，气势逼人。谭献说他“沉